

澳門、馬尼拉與荷蘭人

洛瑞羅*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戰略要地例如莫三比克島、霍爾木茲、果阿和馬六甲建立了鞏固的要塞之後，就成了最早到達中國南海的歐洲人。他們立即參與到當時已經存在的貿易網中，因為當他們經過一條海上路線直接到達東方的時候，其目的就是在亞洲貿易例如稀有藥材、香料、寶石、香木和絲綢的鉅額利益中分一杯羹。在1513年前後，他們已經到達了中國南方的沿海地區，根據當時收集到的情報，立刻注意到中國是東亞地區最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強國。

從很早的時候開始，葡萄牙海外事業的發展就集中在兩個體系。一方面，在葡萄牙王國扶持之下、建立於強大的造船和軍事實力基礎之上的帝國，即後來被命名為印度的國家，企圖依靠其軍事力量或者和平條約在全球的亞洲商品貿易中獲取一大塊份額，以便將這些商品通過其嚴格控制之下的“印度航線”輸送到歐洲去。另一個方面，當時，在葡萄牙王國事業的邊緣有一個影子帝國正在發展之中。這個次生帝國得到了葡萄牙軍人和商人的支持，他們發現，任何人無需費力便可以從東方獲得巨額的利潤。為此，必須擁有一些有價值的產品供應當地市場：一艘商船、用來投資的資本、航海領域的技術知識或懂得兵法。

因此，在15世紀上半葉，當葡萄牙王國的官員在整個印度洋沿岸興建龐大的要塞和商館網的時候，在中國南海，葡萄牙的冒險者們正企圖在中央帝國的南方沿海省份建立一個貿易基地，依靠這個基地，他們可以與其中國夥伴開展貿易交流。在中

國的貿易變成了對參與的各方都有利可圖的事業，而在此之前，中國皇家當局一直反對對外貿易，不鼓勵甚至禁止中國和外國之間的大部分海上接觸。當時，從建立在麻六甲的基地出發，葡萄牙人定期到中國南方海岸，帶去香料、香木、銀器和武器，帶回大量的絲綢和瓷器。

1543年前後，葡萄牙人到達了日本南方，找到了新的重要的貿易機會。當時，日出帝國正深深地陷入在一場曠日持久的激烈的內戰之中，與中國的官方來往早已中斷。但是，日本人對中國的絲綢非常感興趣，總是想方設法用他們豐富的銀器換取絲綢；而中國一向就是亞洲最大的銀器買家。因此，葡萄牙立刻利用這個機會，充當起中國和日本之間不可或缺的中間人角色。由於與日本的貿易，葡萄牙人急需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安全的港口，以便開展貿易。當時，由於諸多原因，中國廣東的官員欣然接待了葡萄牙人，於1557年前後批准他們在澳門半島建立一個貿易基地。

但是，值得順帶談一下在16和17世紀中國南海的格局中“葡萄牙人”一詞的使用。許多時候，要準確地表達歐洲人賦予這個詞的含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有時，它指的是那些出生在葡萄牙因公或因私到亞洲旅行的人。

有時，它指的是那些在亞洲出生卻帶有葡萄牙或葡萄牙/亞洲血統的人。

有時，但不常見，它指的是生活在葡萄牙王國控制之下的東方地區或生活在某一個葡萄牙人聚居

*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里斯本大學歷史學博士，澳門大學客座教授暨葡萄牙東南亞研究中心（里斯本）研究員，現為東方基金會獎學金研究員。



一幅 17 世紀西畫：一艘荷蘭帆船抵達中國港口（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
引自羅格·格佩特（Roger Goepper）：《古老中國》 巴黎·玻爾達斯·1988

的亞洲港口城市的那些皈依了基督教的亞洲人。

因此，在不同的背景下，這個詞有多種用途。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兩個涵義包括在“葡萄牙人”這個詞的涵義中。例如，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在提及“葡萄牙商人”時，它的意思正是指來自不同國度的一群人，包括在葡萄牙出生的人，同時也包括許多在亞洲土生土長的混血人。

葡萄牙人管理下的澳門很快變成了一個非常熱鬧而繁榮的港口城市，它把廣州同中國南海以及更遙遠的其它地區的一些市場聯繫起來。葡萄牙的船把中國的產品，例如絲綢、瓷器、麝香、大黃、銅、人參、茶等運到日本、印度支那、暹羅、印尼半島和其他更遠的地區。當然，葡萄牙人並不是中國商品的唯一出口商。當時，一些中國商船也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尤其是福建省和南中國海的一些有中國僑民的港口例如北大年（Patane）、汶萊（Brunei）、馬尼拉、萬丹（Banten）等等建立了定期聯繫。葡萄牙人實際上是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唯一的歐洲人。雖然這種局面由於他們在澳門站住了腳的消息很快傳到了西班牙而未能長期保持，但在當時，他們的確是歐洲政治和軍事上最強大的國家。

從1519年到1522年麥哲倫的遠征開始，西班牙人就試圖以他們在美洲的領土為起點，在馬魯古或者呂宋群島建立活動基地，從那裡可以向東亞的巨大市場派遣商隊。但是，直到當時，他們在新大陸和東印度之間找到一條航線的種種努力均告失敗。當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地區建立拓居地的消息傳到西班牙的時候，西班牙當局立刻通過其在里斯本的大使展開了大規模的收集情報的行動，很快組織了1564年新的遠征，並到達了菲律賓。當米格爾·洛佩斯·德·埃加茲皮（Miguel Lopez de Legazpi）在一個葡萄牙助手的幫助下緩慢而堅定地佔領了這些島嶼的時候，他終於發現了返回阿卡普爾科（Acapulco）的水路，因此，為西班牙人在中國的南海沿海地區站住腳開闢了道路。1571年，新來的歐洲人已經在馬尼拉建立了拓居地，從那裡他們將視線投向了當時對於歐洲人來說屬於葡萄牙人專屬貿易地區的中國和日本。

當時，在中國的南海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1575年前後，西班牙人曾企圖從中國人那裡獲得類似葡萄牙人在澳門得到的特許。但種種努力一事無成，因此他們從未得到這種許可。然而，西班牙人卻有一個很有力的藉口，即來自美洲礦場的大量白銀。馬尼拉變成了一個熱鬧的港口城市，福建的中國帆船、每年來自阿克普爾科的西班牙商船定期來到這裡，有時，還可見到澳門的船隻。儘管西班牙人通過間接的方式確保在中國的出口中佔有重要的份額，但是，葡萄牙人還是掌握着自1571年以來在澳門和長崎獲得的貿易特權。每年來往於果阿和日本南方的被稱為“澳門大船”的葡萄牙人的巨型商船繼續他們自16世紀中葉開始的在中國南海的航行，使許多葡萄牙船長發了財，而使他們感到頭疼的問題僅僅是當地特有的偶爾發生的颱風。當然，必須在此提到繼續利用同一航線的其他中國、葡萄牙、日本、暹羅的較小噸位的船隻獲得的利益。但是，在這種情形下穿越中國南海的海上航行對葡萄牙人來說似乎相當安全，這也許是因為他們的船隻所擁有的強大火力。

在東亞、東南亞和其他地區，1581年對於伊比利亞人的利益來說是特別重要的一年，因為恰好在這一年，由於一系列不幸事件造成葡萄牙王室沒有繼承人，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國王同時成為葡萄牙的君主。根據伊比利亞君主制定的王室規定，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帝國應採取獨立的發展道路。但是，面對中國南海的巨大利益，一般公民甚至就連澳門和馬尼拉當局常常也無法對別人的貿易保持遠離的姿態。來自伊比利亞王室接二連三的命令雖然反對，但也僅僅能夠保證前往馬尼拉的葡萄牙人的旅行與西班牙人對日本和中國沿岸的遠征同樣的頻繁。這就是說，與馬尼拉的貿易在伊比利亞聯邦時期應當有了巨大的增長。

然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統一給葡萄牙人造成了可怕的後果，菲利浦二世在北歐的敵人已經準備好對伊比利亞的海外帝國發起猛烈的進攻。當時，荷蘭人已經通過葡萄牙獲得了亞洲的商品，但是現在，這個國家卻不能為其所用了，於是，荷蘭人決



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畫像

定直接前往東方。這樣，在1596年，根據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在果阿居住期間收集到的情報，一支荷蘭艦隊在豪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的率領下直奔葡萄牙人的勢力較為薄弱的印尼群島而來。遠征取得了成功，至少證明了好望角線路是可以打破的。第二年，更多的荷蘭船隻前往東方，向伊比利亞對中國南海的壟斷地位發起了挑戰。

與一個世紀以前的葡萄牙人一樣，荷蘭人不久就發現，亞洲的貿易航線上有自己獨特的運作方式。要想在馬魯古群島買香料，需要用印度的紡織品交換；要想獲得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必須用東南亞的香料和香木交換；要想得到日本的銀器，祇能用中國的絲綢交換等等。為了獲得長期而豐厚的收益，與東方的貿易必須是多方面的，為此，荷蘭人

必須在整個亞洲的沿海地區建立商館，就像在他們之前葡萄牙人曾做的那樣。顯而易見，中央帝國被看做是在中國南海的大環境中最重要的夥伴。因此，荷蘭人從很早開始就試圖在中國的沿海地區找到落腳點。

1600年，荷蘭人第一次來到了菲律賓，當時，奧利佛·馮·諾特（Olivier van Noort）率領的一支船隊穿過群島，來到了馬尼拉。西班牙的回應出乎意料，入侵者被打敗，一些荷蘭的俘虜被處以絞刑。毫無疑問，在西班牙人控制的地區，荷蘭人被當成危險的敵人對待。那麼，在葡萄牙人控制的地區又怎麼樣呢？第二年，在雅格布·馮·內克（Jacob van Neck）的率領下，一支船隊抵達澳門，一些人在此登陸上岸，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後來被葡萄牙人處死。在此之前，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在印尼群島就曾經發生過小規模的戰事，葡萄牙人非常清楚，剛剛到來的歐洲人企圖控制亞洲貿易的大部分。他們也知道，任何外國人對澳門的插手都會危及其與廣東當局已建立的良好關係。既然在澳門建立的和諧局面得來不易，因此，他們不準備接納其他歐洲中間人插手中國的貿易。

澳門的這段插曲被認為是葡萄牙與荷蘭在亞洲關係的轉捩點。據說，在馮·內克返回歐洲之後，荷蘭後來進行的遠征不僅對西班牙人來說，而且對於葡萄牙人來說，都帶有明顯的敵意，並從此發起了向伊比利亞的陣地和利益的一系列進攻。然而，現代的研究證明，除了之前開始的敵視之外，荷蘭船隊的船長們接到了明確的指令，要他們採取一切適當的方式甚至包括軍事方式打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亞洲的利益，這註定了在以後幾年中局面的惡化，因為荷蘭人決不會放棄他們與東印度建立鞏固的貿易關係的努力，而葡萄牙人，或者更確切地說伊比利亞王室，也不會允許他們建立這種關係。

自1602年起以及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即VOC的建立，荷蘭人在亞洲的活動由於有了統一的領導而變得更加協調和具有更大的組織性。每年都有船隊從荷蘭前往亞洲海域，運來越來越多的物資和人員。荷蘭的戰略

是簡單而直接的，與葡萄牙人在一個世紀之前採取的戰略略同：

— 佔領印尼群島和中國南海所有可能的重要位置；

— 控制亞洲昂貴的商品貿易之大部分；

— 利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對抗歐洲競爭者。

這樣，在17世紀前十年，東亞和東南亞海上發生了重大變化。

荷蘭人把葡萄牙人當作最重要的攻擊目標，對其要塞和船隻的進攻成為他們行動的主要特徵。1603年，“聖卡塔琳娜”（*Santa Catarina*）號，一艘來自澳門的裝載着價值約三十噸白銀的昂貴商品的葡萄牙商船在萬丹附近被荷蘭人截獲；第二年，一個荷蘭艦隊鋌而走險，封鎖了果阿的入海口，同時，一些葡萄牙船隻在較遠的蘇拉特（*Surate*），柯欽（*Cochim*）和爪哇海被截走；1605年，葡萄牙在安汶（*Amboino*）和帝多雷（*Tidore*）的要塞被強佔。1596年和1605年之間，約有一百艘荷蘭船隻來到亞洲，其規模再明顯不過地對伊比利亞的控制構成了威脅。

現有一些資料認為，荷蘭人進入亞洲貿易圈時取得的成功應當歸納於這樣一些原因：

— 荷蘭人的“家庭作業”，他們事先收集了當時在歐洲所能得到的所有關於亞洲的資訊，例如林索登和豪德曼收集的資訊。

— 然後，揮師直指香料和藥品充足、葡萄牙人勢力比其他東方地區較弱的印尼群島。

— 另一個有利因素是，在東南亞的這些地區，政權體制較為鬆散和薄弱。

— 渴望與那些不看好葡萄牙人的亞洲統治者儘快建立同盟。與伊比利亞人相反，他們從不將貿易與宗教聯繫在一起，因此，荷蘭人對亞洲人的態度不取決於這些人是否接受基督教。

— 出其不意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儘管葡萄牙人已經收到了關於北歐的強國企圖染指好望角航線的壟斷，但是，對如此龐大而迅速的打擊卻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

— 荷蘭人擁有製造和武裝精良的船隻，他們自己就是卓越的航海家和優秀的砲手。在海戰方



從因蘇林迪亞到臺灣的亞洲沿岸地圖（引自《東印度國要塞、城市 and 居民點地圖冊》） 1640 年佚名葡萄牙人繪

面，唯一能與他們匹敵的毫無疑問祇有葡萄牙人。

——但是，在整個亞洲海域，葡萄牙人早已被人們習慣地視為夥伴，他們的船上已經不再裝備重砲，有的祇是輕型武器。

——而且，他們的作戰方式也已經亞洲化，與其說他們擅長砲戰，倒不如說他們更習慣於短兵相接的肉搏戰。他們的船隻除了常常超載貨物之外，在人員方面，平民乘客也常常多於武裝的士兵。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在與荷蘭最初的交手中，他們的船經常在遭到突襲時被荷蘭人抓獲。

事實上，荷蘭雖然已經在東方獲得了鞏固的陣地，但是，卻在葡萄牙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引發了一系列新的涉及貿易、軍事和造船業的問題，而如果想在亞洲海上保持其地位和影響，他們就必須迅速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伊比利亞王室不斷給果阿和馬尼拉發來命令，有時運來人員和物資的支援，鼓勵印度國重新組織防衛，並採取有力的反擊措施。在後來的幾年中，葡萄牙重修了要塞，兵員得到了補充，生產了新的火砲，配製了品質更好的火藥，建造了戰艦，以及更快捷的商船隊。同時，在航線上採取了安全措施並努力擴大陣地。嘗試與從前的敵人建立聯盟，並且派遣船隊開展長期的海上作戰。在整個亞洲海域，荷蘭人遭到無情的追擊和打擊。

荷蘭人在東南亞大陸和島嶼取得了特別的成功，在所有可以與來自天國的船隻接觸的地區建立了他們最重要的基地（占碑Jambi，雅加達Jakarta、萬丹、大城府 Ayuthia、安汶 Amboino 等等）。但是，中國南海的貿易正如已經談到的那樣，使他們不得不走得更遠。顯而易見的是，中國在荷蘭人的視線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換句話說，荷蘭人必須在中國沿海地區建立拓居地，就像葡萄牙人在澳門做的那樣，或者在其它地區，那裡的中國僑民可以長期提供中國貨物，就像西班牙人在馬尼拉所做的那樣。

——荷蘭人多次企圖佔領馬尼拉，自1609年起，他們定期對馬尼拉發動進攻或者實行封鎖，但

總是收效甚微，因為西班牙人成功地在各個戰線進行了抵抗：菲律賓的首都繼續固若金湯，荷蘭人對於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總是鞭長莫及。於是，荷蘭人沒有辦法祇好進攻那些每年從福建到菲律賓首都來的軟弱無力的中國商船。

——後來，荷蘭人開始向澳門進發，然而澳門雖然沒有堅實防衛，卻成功地保衛了自己。1622年，他們擊退了荷蘭人對這個中國—葡萄牙港口城市的進攻。在這場戰鬥中，荷蘭人派出了克內利烏斯·雷亞森（Cornelius Reyersen）率領的由八艘戰艦和約八百人組成的強大的遠征隊，他們在澳門登陸，以為能夠很快輕易地以軍事佔領澳門。葡萄牙人千方百計頑強抵抗，入侵者被完全打敗，人員傷亡慘重。荷蘭人經常變換做法，有時攔截來往澳門的中國或者葡萄牙的船隻，有時對澳門實行封鎖。

但是，自1609年起，荷蘭人獲准在日本建立商館。與在亞洲其他地區相反，他們採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並對日本採取外交親近的做法，對穿過中國南海前往暹羅、菲律賓或者東京（Tonquim）的日本商船從不採取敵對的態度。這也許是由於間諜報告曾提到葡萄牙人當時與日本中央當局發生的問題。事實上，到達日本的天主教傳教士，尤其是來自澳門的傳教士和後來來自馬尼拉的傳教士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受歡迎，因為日本政府將人數眾多的基督徒視為其正在進行的國家統一之最大障礙。結果在1614年，所有基督傳教活動在日本被禁止。在長崎經商的澳門葡萄牙商人從沒有完全與同船而來的傳教士截然分開。不久，葡萄牙人開始面對嚴重的困難，因此，荷蘭人極力充當起中國與日本貿易的中間人的角色，因為他們對宗教活動不感興趣，而僅僅對貿易情有獨鍾。

沒有中國絲綢的長期供應，在日本的任何外國商棧幾乎都毫無用武之地。因此，由於即不可能佔領澳門，也不可能佔領馬尼拉，於是，荷蘭人在中國沿海地區先是選擇了澎湖，之後，又選擇了台灣。這些島嶼並沒有自己的絲綢生產，但是，據他們推測，從自己的領土前往日本或者菲律賓的中國帆船可以通過武力或者其他方式被吸

引到這裡，一個離他們的始發港較近的歐洲殖民地。荷蘭人的基地被建在大員（Tayouan），臺灣西海岸的一個半島，但是，除了海盜行徑之外，在貿易方面卻進展緩慢，直到1633年，著名的海盜鄭芝龍（Nicolas Iquan）開始向荷蘭人提供絲綢和其他中國貨。但是，荷蘭人在臺灣的殖民地從來也沒有像他們希望的那樣，成為一個可以與澳門或者馬尼拉匹敵的熱鬧的國際港口城市。相反，卻變成了一個以當地農業稅收為基礎的殖民地，但其不久便被荷蘭人拋棄了（1662）。

由於一系列同時發生的變化和政治動盪，1639-1641年這個不長的時間無論對在葡萄牙或是在亞洲的葡萄牙人來說都是決定性的：

——1639年，由於無視不得對長崎派遣傳教士的禁令，作為日本政府發出的一系列威脅的延續，葡萄牙人被全部驅除出日本。從當時掌管日出帝國大部分最高軍事權力的幕府的觀點看，基督徒威脅到日本為全國統一而作的努力。對於葡萄牙商人來說，從日本被驅除意味着他們最長久並最盈利的事業的終結。

——1640年，在里斯本，布拉甘薩公爵唐·若奧（D. João）發動了一場政變，單方面宣佈葡萄牙脫離西班牙獨立。除了其他嚴重後果之外，這同時表明，澳門的船隻從此必須遠離馬尼拉，換句話說，從商業的角度看，它們面臨着一個並不令人感到樂觀的前景。

——1641年，在幾年的封鎖與進攻之後，荷蘭人終於佔領了對於印度洋和中國南海之間的交通至關重要的馬六甲的葡萄牙城市。這再次給澳門增添了困難，而且嚴重地影響了未來與果阿和印度的關係。

——最後，同樣不可忽視，在中央帝國發生了極其重要的變化，1644年滿洲人攻入北京，明朝滅亡了，清朝取而代之。在幾十年中，中國南方各省動盪不休，這對澳門產生了負面影響。

但儘管面對所有這些困難，葡萄牙人仍然固守在澳門，也許這正應了一句中國格言：“風起竹簷”。

荷蘭人雖然集中利用一切軍事和海上資源在中國南海取得了無數次成功，但他們從來未能將葡萄牙人從澳門趕走，也未能將西班牙人驅除出馬尼拉。除此之外，他們也沒有能力在中國大陸建立永久基地，而在幾十年之後也祇是被中國當局視為可信賴的夥伴。至於葡萄牙人，儘管在亞洲的其他地區遭受了損失，例如在錫蘭（Ceilão）和印度，但是始終牢固地佔有澳門這個陣地，長期被中國人視為歐洲的唯一對話者。顯然，其中的部分功勞應歸於自17世紀初就居住在北京的耶穌會傳教團，許多時候，他們是作為澳門利益的保護者而出現在中國朝廷的。部分功勞還要歸於馬尼拉經常對土生葡萄牙人提供的軍事支援。儘管荷蘭的威脅始終存在，但是由於他們獲得廣州包括較遠地區例如東京、暹羅、爪哇、望加錫（Macaçar）、帝汶和菲律賓的商品方面具有的便捷條件和在商品選擇上的多樣化，葡萄牙-中國港口城市仍然繼續在中國南海起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西屬馬尼拉表面上並沒有出現嚴重的問題，頂住了荷蘭人的不斷壓力，同時，增強了對菲律賓廣闊群島的控制。阿卡普爾科商船的活動全面展開，與墨西哥建立了定期的聯繫而且有利可圖。由於馬尼拉的華人界繼續用他們龐大的船隊進行着貿易，也由於澳門商船的活動在伊比利亞聯合王國期間甚至在光復之後從未中斷過，菲律賓一直保持着同中國的貿易關係。為了對付荷蘭在中國南海的威脅，西班牙當局多次制定雄心勃勃的計劃，企圖建立馬尼拉和印度國的軍事聯盟。但是，這個聯盟從來沒有得以實現。首先，是由於西班牙當局過分憂慮當時印度洋的形勢，那裡，荷蘭人漸漸地掌握了原屬於葡萄牙勢力範圍的港口和地區的控制權。其次，由於距離印度十分遙遠，澳門議事廳對於其管轄的地區有很大的自主權，而且也沒有從較近的馬尼拉的聯盟那裡獲得過真正的實惠。與菲律賓的密切的政治關係意味着澳門人將喪失其重要的自主權，同時，也意味着他們可以預見的但決不希望發生的情況的出現，即西班牙商人和傳教士插手中國事務。

蔚 玲譯